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中国民族志 电影先行者口述史

郭净 等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王天玺 主编

刘大伟 郭净 副主编

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 口述史

郭净 等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 / 郭净 等 编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3

(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

ISBN 978-7-222-12741-8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志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563号

出 品 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高 专 马跃武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校对: 王 雪 张 彦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名	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
作者	郭净 等 编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80千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2741-8
定价	6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编写组

郭 净：民族史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徐何珊：民族学硕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谢春波：民族学硕士，云南民族博物馆馆员

陈 湘：（北京）民族出版社西南工作站负责人

王 珍：《中国民族报》记者

总 序

王天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有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辽阔的中华大地闪耀着斑斓璀璨的多元文化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成为新中国国家整合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为了正确执行这一政策，推动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组织大批学者和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参与者有诸多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有大批民族学者、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料，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电影记录手段，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制作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有《黎族》《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大瑶山瑶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西藏的农奴制度》《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傜人》等20余部。这些影片系统地记录和复原了我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依据。

这批纪录片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志电影特色的新片种，为后人留下了反映那

一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是我国多民族影视文化的宝贵遗产。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等影片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光明日报》，1987年2月25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纪录片的吸引力经久不衰，也深得国外同仁们的肯定与赞赏，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是极有价值的，它丰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影视文化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珍贵的民族志纪录片，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将愈益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曾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保存与影片有关的文字档案，应将这批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提纲、分镜头剧本和影片完成台本选编成册，出版发行，以便于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研究时参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和民族学研究室主任詹承绪，副主任曹成章、满都尔图，研究员吕光天的积极支持鼓励下，杨光海等前辈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编选出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这项工作，开启了收集整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文献资料的先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民族研究机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的文博部门、电视台甚至个人，为了科研、教学、旅游、文化宣传的需要，投入了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和研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志影像的关注。在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要建设文化强国，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在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策划了这套“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旨在发布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和民族志摄影的成果，使之以纸质载体的形式流传于世，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出版之际，我们深情怀念最早提出编写本丛书想法的已故汪宁生教授和刘达成研究员，并向当年开创民族志影像的先驱者，谨致谢意！

绪 论

郭 净



2010年云南大学召开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参加开幕式的（从左到右）有刀永明、徐志远、谭碧波、杨光海、瞿开森、蔡家麒、杨毓骧（郭净摄）

如果从1933年凌纯声和勇士衡到湖南拍摄苗族考察的影片算起，中国的民族志电影已经走过80年的历程。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3—1949年，民国边疆考察电影时期；

1957—1981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民族志影像或影视人类学时期。

这三个时期摄制的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承袭着若明若暗的学术脉络。而本书所探讨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处在民国边疆考察电影和当代新民族志影像之间，既联系着前者，又启迪着后者。我们要研究中国电影的历史，或探讨中国民族志影像的传统，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批影像文本本身，而旨在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有关的人物与事件，放到社会史和生命史的背景中予以考察。我们想以口述实录的形式，重现这些影像摄制的过程，触摸参与者的人生经历，并从中体会那个时代特殊的氛围。

从1957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配合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一些有经验的民族学家提出建议，得到国家高层领导支持^①，政府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实施了为中国大陆每个少数民族摄制一部民族志电影的计划，彼时官方文件对这批影片的称谓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这批电影和它们的摄制者。

这批影片尽管动员了国家的力量而创作，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问世后长期未与公众见面。“文革”后，它们却像出土文物一般，逐渐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关注，进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代表作，亦在国际人类学界获得很大声誉。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因所表达的内容包含鲜明的政治色彩，一度被年轻的纪录片作者和研究者诟病乃至冷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批影片最早使用的名称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有如下说法：

由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主任夏辅仁和业务秘书张正明代表调查组和科研人员意见，到承拍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同厂长陈波商议后，将这种片子命名为“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其后，根据这种影片的性质和特点，正式修订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并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②

根据以上叙述，民纪片最初曾叫作“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之后改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后一个确定的名称由三个关键词组成，每个词都有特定的含义：

其一为“少数民族”，这是1949年以后，由新建立的国家政权确定的对汉族以外各民族群体的标准称谓，它被纳入“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政治概念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二为“科学纪录片”，这个词是用来对这批影片定性的。1961年9月，主持这批影片摄制的文化部和全国人大民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历时近一个月。在9月7日的会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齐燕铭做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提出：

① 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6页。

② 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第六章（本章由陈景源撰写），197页。

刚才听空了同志^①介绍，有科学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科学研究片好几个名称。各种不同的名称，各有不同的目的。现在已搞出了七部片子，通过对这七部片子的总结，我们首先要把这种片子的目的性明确起来。我看这种片子就是科学纪录片，对不对，请大家研究。^②

从这段讲话看，似乎到11月7日的会议总结，才确认了齐燕铭的观点，指明了所谓“科学纪录片”的含义：

应该明确，这种影片就是科学纪录片，不同于科学教育片，新闻纪录片，更不同于故事片。过去由于对影片的目的性不够明确，在影片中既有科学纪录片的内容，也有新闻纪录片或者其他片种的内容，以致减弱了影片的科学作用。

摄制科学纪录片的目的是纪录少数民族原来的社会面貌，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同时根据需要向有关人员进行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③

据此可知，在1961年以前，关于民纪片的目的和名称存在不同看法，而此次座谈会将这批影片冠以“科学纪录片”的名称，旨在认定它们的“科学研究”性质，因而在中国电影中创立了一种区别于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的新片种。这种以“少数民族”为对象，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纪录片，尽管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却已具备“民族志电影”的基本特性，应当归属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形态，以区别于“文革”后在“影视人类学”观念指导下兴起的新民族志影像。上述座谈会纪要提到这次拍摄计划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北京科影厂的有关人士参加，由此可以推测，“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这一标准的提法，是经过讨论斟酌的，当有民族学者和电影专业人员的意见参与其中。

其三为“社会历史”，这个词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发展观

① 文中的“空了同志”为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萨空了。参见齐燕铭：《齐燕铭同志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年。

② 齐燕铭：《齐燕铭同志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1页。

③ 《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摄制工作总结提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8—9页。

点，而且包含着“抢救落后”的含义，它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大调查基本内容做出界定的词汇。据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词是彭真根据毛泽东同志1956年春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的：

1956年春，彭真同志找张苏、刘格平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他说，最近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我看，这件事就请彭真同志主持吧，由全国人大民委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专家、干部进行此事。

彭真同志说，这件事是全国性的，就叫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吧。^①

当时在民族学领域，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中国的民族研究应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注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有见于记载的历史，甚至一些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故而此次大调查强调不仅要进行现状的调查，也要进行历史的调查。^②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便界定了民族大调查的基本内容。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与此次行动有关的调查活动一律被称之为“社会历史调查”，做调查的机构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与之相应，作为调查手段的电影拍摄也被冠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影片的制作。

可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这一名称有着明确的政治寓意，也蕴含着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学术内容。可以说，它的表达非常准确而鲜明。今后，若能根据更多的资料对这一名称详加探讨，或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民纪片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二

即使在“文革”以前，知道民纪片的人也并不多。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87年硕士毕业后分到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出于对民族学的兴趣，我对这批影片有所耳闻，也知道院图书馆收藏着一批胶片拷贝，还听说香港

^① 底润昆、张正明《彭真同志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民网“彭真纪念馆——评论研究”，<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99985/100001/9809365.html>。

^②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60页。

导演张铮^①曾骗取有关部门的许可，将其中许多段落剪去，放到他的民族风情片里，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的愤怒。然而，我从来没有动心思要去看看这些影片，或者对之做点研究。触发我对它们加以关注的，是两位年轻的纪录片人杨昆^②、和渊^③，而他们对这些影片的认识，则得益于德国人瞿开森（Karsten Krueger）的启发。据瞿开森的回忆，他是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读书时知道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有这么几部片子。1983年他第一次到昆明，云南省外办设晚宴招待外国留学生，饭后请他们看了其中的几部影片，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89年4—5月，民纪片最重要的摄制者杨光海先生（当时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到德国参加影展和学术交流活动，应邀到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IWF）^④访问，在那里放映了《佤族》《独龙族》和《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片子。瞿开森闻讯，到旅馆与杨光海见了面。^⑤之后，瞿开森选择了中国的民纪片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题目。为收集研究资料，他于1990年带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到北京访问，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⑥达成协议，由民族所将该所收藏的12部民纪片35毫米胶片拷贝提供给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后者负责将其重新编辑并转成贝塔康姆的录像带，在欧洲出版发行。从1991年到1996年，这项工作由瞿开森负责。^⑦

1999年，经过瞿开森、郝跃骏^⑧等人牵线搭桥，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与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⑨合作，申请到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开办了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杨昆、和渊都是这个班的学生，而瞿开森则是德方

① 张铮，男，香港演艺界人士，于1979年摄制《云南奇闻录》，这是关于云南的第一部“民族风情片”。

② 杨昆，男，原云南农业大学英语教师，曾就读于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是“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主要策展人之一。

③ 和渊，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学者，纪录片作者，曾就读于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是“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主要策展人之一。

④ 该研究所的名称又译为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其详情参见汉斯·卡尔加勒（瞿开森）：《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概况》，《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7—21页。

⑤ 参见本书瞿开森与谭碧波的谈话，以及杨光海：《民族影志田野集录》，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278—290页。

⑥ 杜荣坤1988—1996年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⑦ 见本书瞿开森对谭碧波的访谈；瞿开森：《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影片系列》，《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99—100页。

⑧ 郝跃骏，男，云南电视台编导，纪录片导演。有关瞿开森、郝跃骏参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创建的情况，参见郭净、徐菡、徐何珊：《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8—130页。

⑨ 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最早以“影视人类学”命名的教学和科研机构。

的项目负责人，在云南大学科学馆拥有专门的办公室。当时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观看大量的经典纪录片，其中包括德方列入典藏的中国民族影片的录像带。和渊回忆说：

大家都知道研究所的另一个德国人瞿开森一直在做这批影片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给我们看了其中一部1957年拍摄的《佤族》。可西方纪录电影的一些理论半生不熟地被装进了这些年轻人的胃里，结果年轻人在《佤族》里找到了尽可能多的“错误”，影片里太多的搬演摆拍，大量的阶级分析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当时这些已经足够让我们觉得影片的惨不忍睹。^①

尽管如此，随着这些影片传播范围的扩展，它们的价值日益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年轻一辈的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2002年开始，和渊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这些片子，探讨它们的历史，他谈到自己的感受时说到：

这批影片当时是作为内部资料与学术研究用而从未公开放映过，所以长时间以来，国内很少有纪录电影的研究者真正地关注过它们，更不用说一般的电影爱好者了。而且对于像我们这些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纪录片的年轻人，我们总认为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电影，而对于老一代的电影工作者来说，新闻纪录片几乎成了中国纪录电影史的全部。就这样，那批关于少数民族的纪录电影成为在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缺失了的、不被人所提起的纪录影像。^②

2003年，我跟和渊、杨昆等人策划“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后改名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按照他俩的提议，在“回顾单元”中安排了《佤族》《鄂伦春族》和《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个片子的放映，讨论由瞿开森主持。我们还请来了杨光海和蔡家麒两位前辈与观众交流。闭幕式上，我们特地为杨光海先生颁发了“云之南奖”，那是一枚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滇王金印”的复制品，想以此表彰老一辈纪录片人所做的贡献。会后，《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站的记者张文凌发表了报道《有重大贡献但却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

① 和渊：《寻找缺失的影像》，郭净主编：《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3页。

② 和渊：《寻找缺失的影像》，郭净主编：《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手册》，14页。

影人》^①。到了2007年,《中国民族报》记者陈湘和王珍又一次呼吁人们关注这批老电影和它们的拍摄者。^②这些报道和活动虽然产生了社会效应,但在新一代的学者当中,一直很少有人像瞿开森那样切实地投入对民纪片的研究。

其实,这一领域最早的研究者还不是瞿开森,而是当年参与民纪片摄制的几位先行者本人。“文革”后期,杨光海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先后被安排到文物出版社和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1977年,他有机会调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家研究单位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纪片摄制的委托者。民研所专门为杨光海成立了电影组,他从此得以重操旧业,这大大刺激了早就为改行而苦恼多年的几位朋友的激情,他们以通信的方式一再商讨,力图为重振民纪片拍摄的事业做点事情。1978年,他们把私下的交谈变成了论文,以杨光海、詹承绪、蔡家麒、刘达成联名的形式,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2期发表了《努力摄制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片》一文。这是他们发出的心声,也是“文革”后第一篇探讨民纪片的论文。

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供职的杨光海,因拍摄的影片引起争议,被迫停止工作,电影组也被撤销。在无法从事影片摄制的境况下,他转而着手整理遗留的文献,编辑了两部资料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第一辑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这两本书至今仍是民纪片研究可利用的最基本的资料。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批“民纪片”被越来越多地称作“民族志电影”或“民族志影片”。把“电影”“影片”与“民族志”挂钩,应当是“文革”后对外交流之门逐渐打开、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结果。原来我以为,这个说法最早起源于1988年云南省社科院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三人发表的《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③一文,其中使用了几个概念,如“人类学影片”“民族志影片”“民族志电影”,这些概念都来自英文Ethnographic Film。而且,该论文明确地将早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称为“民族志影片”:

另一方面是已经形成一种僵化固定模式的,经历了风风雨雨、道路曲折而今已经停步,非有新的学科理论指导就难以再继续发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民族志影片)。^④

① 张文凌:《有重大贡献但却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人民网,2003年4月10日。

② 陈湘、王珍:《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中国民族报》2007年8月10日。

③ 该论文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4期。

④ 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4期,75页。

然而，近年我们收集到杨光海和徐志远之间的一些通信，在整理这些信件时，我才发现这个新名词最早出自何处。“文革”以后，杨光海在私人通信中一直把“民纪片”称作“民族片”和“民族电影”，如：

这次在贵州拍民族片是第一次，各方面都较重视……

——1979年元月7日给徐志远的信

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对民族片就洗手不干了，准备回制片厂。

——1979年6月1日给徐志远的信

我还听说今后云南拍民族片的协作就要转移到民族所来了，也好叫你和我们合作。

——1981年2月26日给徐志远的信

拍民族片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为各族人民的子孙后代着想的……

——1982年2月12日给徐志远的信

然而，从1982年中旬以后，杨光海给徐志远的信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提法：

（给院领导的报告中）我论述了民族电影的产生，电影组建立的经过，国外民族志电影的发展……

——1982年7月3日给徐志远的信

在同一封信里，他把“民族志电影”的概念延伸到了“民族片”的领域：

我坚信我国的民族志电影事业必胜，而且要有一批勇士为之献身。因此，我必须坚守在北京，坚守民族电影阵地……

2013年10月下旬，我第二次到密云县拜访杨光海先生，他告诉我，就在电影组撤销的那段时间，民族研究所一位管理图书的老先生正在翻译一本论述影视人类学的英文著作，杨光海看过其中的部分章节，由此知道了国外有民族志电影。

而当时杨光海采用“民族志电影”这个新名词，意在突破眼前的困境，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当时的背景是，就在前一年，民族研究所领导因杨光海拍摄的影片受到非议，下令撤销了成立不久的电影组。愤懑之际，杨光海写了八九千字的申诉，上报中国社科院负责人。他在1982年7月6日给徐志远的信里，简述了这份申诉的主要内容：

在国际上有民族志电影，美国已出版了民族志电影理论专著，日本民族学博物馆有数百部民族志影片，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只拍摄了十七个民族的二十多部影片，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民族电影可望振兴发展之时，又遭到了挫折，但我深信不会长久的，我国的民族志电影事业是党中央制定的，它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文中所说美国出版民族志电影的专著，就是杨光海在图书管理员那里看到的译本。在给徐志远的信里，他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志影片”和“民族志电影”的称呼。杨光海试图用这个新的称谓说服社科院的领导：这个事业既延续了早期民族纪片的传统，也回应着新时代的国际学术潮流。1978年到1981年，杨光海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重新拿起摄影机。但时过境迁，民族学尚在复苏，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已不再被上层关注。他虽然得到民族所领导秋浦、詹承绪等人的支持，却依然面临重重困难。正当他孤独前行，深受打击的时候，却无意中占得了先机，有幸最早接触到国外传来的“民族志电影”概念，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助力。就在失意与激愤的复杂心绪下，他成了把旧的“民纪片”和新的“民族志电影”这两条线索衔接起来的第一位学者。

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第三辑发表了论文《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回顾与展望》，对民纪片的历史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并再次表达了延续这项事业的愿望。在文章结尾，他提出如下建议：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想对民族科纪片的名称提出个人的想法。现在通用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这一名称，是在19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定下来的，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这一片名不仅冗长，而且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容易与其他纪录片相混同，改名为“民族志影片”更贴切些，更能突出这类影片的性质特点。当前在国外也将这类影片称为民族志影片。片名的更改，还可以与国外同类影

片的名称相一致，以利于国际的文化交流。^①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民族志电影）的概念。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民族志电影正在发生的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主导者，而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的作为，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文中，杨光海并未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展开深入讨论，他也尚不具备相关的理论功底。而当时中国民族学作为一个整体，也还没有挣脱单线进化论的束缚。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包括杨光海在内的少数学者已经察觉到风向的转变，开始试探着摸索新的方向。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拍摄了纪录片《白裤瑶》，第二年送法国真实电影节参展，获得提名奖，率先打开了与国际影视界交流的大门。1985年，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访问中央民院；次年，美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也到该院访问，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带来了“Visual Anthropology”的学术概念。也是在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学者李德君在美国《影视人类学通讯》（SVA Newsletter）发表《影视民族学在中国》（Visual Ethnology In China）一文，提出建设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想法。^②到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和郝跃骏三位云南学者首次对“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概念以及内容做出了全面阐述。他们以《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这篇论文，为中国的纪录片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从此，“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理论范式逐渐取代了民纪片的模式，成为学术评判的新标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少数民族纪录片摄制的活跃，20世纪50年代跟杨光海合作拍摄《独龙族》的刘达成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他于1956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读书，1958—1960年两次参加少数民族调查组，到云南从事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社会历史调查，1961年分配到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做研究，期间参与了《独龙族》影片的摄制。1971年，刘达成从五七干校调回昆明，到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随该所转到新成立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做科研。刘达成跟杨光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对民纪片的复兴抱有极大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又因为跟郝跃骏、林超民（云南大学副校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瞿开森、刘跃辉（云南民

① 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回顾与展望》，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44页。

② 朱靖江：《影视人类学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版）4期，2014年2月。

族电影制片厂)等人来往,以及参与新的民族风情片和纪录片的拍摄,而对纪录影像今后的方向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1991年,他与《昆明社科》杂志合作,借该杂志的版面开辟了“民族影视文化研究”专栏,并于该专栏发表了《云南民族影视文化的历史回顾》一文。在这篇论文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刘达成提出了一个横跨纪录片与风情片的“民族影视文化”的大框架,并将这个框架与引进不久的“民族志影片”和“影视人类学”的概念做了对接。^①

瞿开森对这类新名称的产生和流行也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可以说是最早对中国民族志电影进行探讨的外国影视人类学家之一。在对外介绍民纪片的时候,瞿开森用的是Chinese Historical Ethnographic Film(中国历史民族志电影),和Scientific Documentary Films on Minority Nationalities(少数民族研究的科学纪录电影)这两个词组。^②他和杨光海、郝跃骏、刘达成都熟悉,想必在私人的场合,他们之间曾对这些新概念和新名词做过交流。因此,在用中文表达的时候,瞿开森也使用了和英文相对应的“民族志影片”这个词,如在1995年4月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对民纪片就做了如此描述:“这些影片是真实的民族志影片。”^③

当新的理论和影像日渐流行的时候,参与过民纪片摄制的前辈们并未在一片喧哗中陷入沉寂。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杨光海、徐志远、蔡家麒、谭碧波等人都在整理、发表他们的成果^④,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学者找他们收集民纪片的资料,尤以几位云南的学者(谭乐水、鲍江、陈学礼、张海、郭净、徐何珊、谢春波等人)以及鄂伦春族的文化人用力最勤。这种新旧两代学人之间的传承关系,成了中国民族志影像别具一格的风景。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就整体而言,这些年,虽然有媒体的宣传,也有少数学者的讨论,关于民纪片及其作者的研究依然处于草创阶段。除了先行者们自己的努力,以及鄂伦春基金会和北京民族博物馆在2011年整理、出版了《纪录片档案:鄂伦春族》^⑤一书和对杨光海就影片《鄂伦春族》拍摄所做的访谈外,在此领域深入扎实的专门研究甚为稀少。直到近年,才出现了几个有分量的研究,如鲍江的《返回你我田野:倾听人

① 刘达成:《云南民族影视文化的历史回顾》《影视人类学在云南》《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民族学的实践与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 Karsten Krueger, The Other on Film—The Chinese Historical Ethnographic Film Series(1957—1966),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34页、40页。

③ 张江华:《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11期。

④ 参见杨光海:《民族影志田野实录》,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徐志远:《佤山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蔡家麒:《田野拾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谭碧波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影片脚本汇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刘达成:《民族学的实践与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⑤ 杨光海编著:《纪录片档案:鄂伦春族》,民族出版社,2011年。